

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超250万英国人 请愿二次公投

全民公投不是“过家家”参加投票的英国选民看到结果是“脱欧派”以约120万票的优势胜出后，眼镜碎了一地。现在超250万英国人请愿二次公投。



为了觅食 松鼠大玩劈叉功

松鼠为了觅食而奋力爬到花茎顶端、横叉于两花间。这有趣的一幕正好被48岁的建筑师海尔特拍摄了下来。



韩国妹子打造 魔幻惊人“隐形妆”

22岁的韩国妹子Dain Yoon是一位视错觉方面的大师，现就读于韩国国立大学。她将艺术和化妆相结合，打造了一系列充满魔幻色彩的“隐形妆”，堪称将化妆化到了至高境界。



父女的爆炸发型 酷到没朋友

头发浓密蓬松是黑人的种族天赋但作为艺术家的Benny显然有着崇尚自由天然的天性，不仅自己顶个超大型的爆炸头，他自己的女儿也有样学样，留起了跟老爹一样的发型。

周末人物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特稿

1931年清明节，30岁的邓恩铭血洒济南纬八路刑场。“多想想受苦受难的同胞，少考虑个人得失，眼向前看……我们也要每人割掉自己身上的污秽、与《共产党宣言》不附和的污秽。”他那铮铮誓言，仍绕耳边。

邓恩铭：为多难祖国“不惜身先死”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

1922年拍摄的照片。五角星书籍的右边是邓恩铭拿笔书写，左边立者是王尽美。两人在讨论会议内容。

1921年7月23日晚，上海的酷暑夏夜中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。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俊侯之兄李书城住宅内。这是一幢漂亮的石库门建筑，砖木结构，坐北朝南，外墙青红砖交错有序。

会场陈设俭朴，气氛庄重。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，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。他们是点燃神州红色火种，之后渐成燎原之势，最终映红祖国大地。其中，北方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。

王尽美，长脸寸头，一对大耳虎虎生威。他出生于诸城一个佃农家庭，有幸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邓恩铭，圆脸清秀，留着三七开分头，贵州水族人，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。他与王尽美等积极筹划掀起了济南五四运动的学潮。

95年后，我们沿着邓恩铭同志的革命足迹，发现真正的共产党人有多相通之处，他们用信仰和行动将生命的底色铸成。斯人已逝，他们血肉之躯中迸发的英雄气概却永载史册，留给后人一股气壮山河的精神源泉。

“趁年轻为祖国尽一点微薄的力”

1917年，16岁的邓恩铭从贵州荔波县城出发，随二叔到济南读书。到达济南后，他住在南园子朝山街58号的四合院里。今日喧嚣的济南街头，朝山街已无半点58号四合院的踪迹。邓恩铭从这里出发，步入济南老城的南门，到大明湖南岸的省立一中求学。

此时，在济南商埠经三纬七路上的日本领事馆也叮叮当当开工建设，设计者处心积虑地要体现帝国气势。大批日本人随之蜂拥而至，从建立领事馆前的19人，骤增至2770人。他们先后建立了银行、学校、邮政局、守备队营房、医院、神佛道观以及工厂、戏院等等，商埠地区俨然成了他们的乐园。

邓恩铭眼看着列强在贫弱的国土上耀武扬威，动荡不安、黑暗透顶的社会更激起了他关注国家命运的斗志。他认识到自己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是紧紧连在一起的。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民主、科学的新思想更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。在省立一中的图书馆里，他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。这份杂志从上海向青年发出号召：“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，破除陈腐学说之囹圄。”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邓恩铭将《新青年》的号召付诸实践，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浪潮中：在济南城内外宣传演讲，举行学生联合会大会，组织学生总罢课，组织学生到日本领事馆示威，带领群众包围捣毁支持军阀政府的《昌言报》。济南老城和商埠区，时常跃动着这个贵州小伙子的瘦弱身影。

当运动稍稍平静时，邓恩铭带着头脑里积累的各种问题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。此后，他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、马克思主义的书刊，其中有诸多对《共产党宣言》零星片断的摘译，都促使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。

这种变化像核聚变一样，在年轻人的心里不停地积蓄着能量。1920年正月初五，中午过后，邓恩铭兴冲冲地跑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王祝晨家里。他一进门就找到水缸，端起水瓢咕咚咕咚喝起来。待家人听见动静，再拿开水已来不及了。王祝晨先生关切地说：“这样不好，会弄坏身体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一点小事也不会有。在老家我整年喝凉水，济南凉水和我家乡的水一样好喝。再说我一人有在外，该做的事太多，没有时间烧开，有那时间真不如去看点书。”邓恩铭说着，二人进了屋。王祝晨笑着问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一定有什么大事？”

“是有事，也算大事。关于妇女解放问题，我们几个同学争论不休，我就跑来请教您。缠脚看起来很简单，可阻力太大。从农村回来的女同学讲，一提及脚，农村妇女就放脚不能劳动，起码不会推碾。女同学不服气上去试试，几圈圈全都眩晕在地。农村妇女在一边大笑，弄得女同学落荒而逃。”邓恩铭这一说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看来她们是犯了策略性错误。”王祝晨笑道。“策略性？”邓恩铭不解地追问。“你想想看，她们以自己之短去比人家之长。这些女孩子生来就没推过碾，而生长在山区的妇女，从下生就靠推碾来生存。这不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？”两人又笑了。

“先生，那你说今后怎么办？这个阵地太大了，我们决不能丢掉它。”“看来只能加大

邓恩铭，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。他与王尽美等积极筹划掀起了济南五四运动的学潮。邓恩铭眼看着列强在贫弱的国土上耀武扬威，动荡不安、黑暗透顶的社会更激起了他关注国家命运的斗志。



宣传，以实际行动去攻老百姓的心。要把缠脚的坏处说清楚透彻，不能用城里的比喻，要用农村语言，这就下大功夫。咱们的国家是农民立国，农民一半是妇女，妇女工作是重要的一环。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你说说另一半是什么，还是最关键的一面哩？”王祝晨说道。

邓恩铭思索了一下说：“是不是主观能动性？也就是说，说破大天自己不觉悟，一切都是白来，是不？”“对，这是规律。我们把一些实际问题排出去先缓急来。如果没有实际问题，那还要我们去干什么。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提高认识和锻炼成长的过程。”王祝晨说道。

“是啊！先生你说，一个人是不是被摔打成鼻青脸肿才算成熟？”邓恩铭笑着问。“也不能这样说，这要看他是怎样接受教训。如果接受的是教训的反面那可糟糕了。”王祝晨笑着答道。

“是啊，这就要看这个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，而这两种力量在于自己的大脑站在哪个立场上。我现在认为立场就是世界观，世界观应该建立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上。先生，您说对吗？”“对，完全对。你已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行动指南了，这很好。看来你不只是爱读书，而是爱钻研，自己找准自己的道路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先生。人生是短暂的，要趁年轻为这个多次多难的祖国母亲尽一点微薄的力吧。”邓恩铭肯定地说。

“人生就该这样活。”王祝晨颌首道。

“少考虑个人得失”

彼时，王祝晨的大女儿王淑静为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，用三年时间完成从初中到高中的“三级跳”。她还大胆地走进齐鲁医院外科，要求做双脚放开矫正手术。经医生检查，她的脚骨已定型，无法放开，要每只脚锯掉三个脚趾才成。她二话没说，上了手术台。“尽管这给大姐带来终身痛苦，但她可以穿上定做的皮鞋，像男子一样迈开大步走四方了。”王祝晨的儿子王恒向本报记者回忆道。

王淑静的亲人壮举，可谓妇女解放的先鋒。邓恩铭到王祝晨家，也对此感到好奇，他问道：“同学们都传言你家中大姐到医院去掉了自己好几个脚趾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她正巧去同家温习功课，不然你就可以见到她。这事责任全在我，她从小在农村，时兴缠脚，我那时是大清朝带辮子的顺民，满脑袋封建主义的思想。生米煮熟饭，想改也不容易。开始她要放脚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可万万没有想到她说，现在不赶上潮流，难道到了七老八十再去割吗！”王祝晨甚是心疼女儿。

“大姐的坚强意志，与时代潮流共前进的决心，真值得我学习。我真服啦，女同胞们要都像大姐这样该有多好！”邓恩铭说道。“那妇女工作就做好了，是不是？”王祝晨笑着插嘴说。

“嘿嘿。十个指头没有一般齐，有好就有坏。所以我们的口头禅是：饭要一口一口去吃，事情要一件一件去做，根除操之过急的心态。先生，您说这可以吧？”邓恩铭又问道。

“这样就好，青年最怕的是浮躁，不愿踏踏实实，愿露脸，不愿埋头苦干。”王祝晨说道。

“对对对，刚来之前我们还争论这些缺点如何改正呢。暂时还未统一起来，多数同意一条：多想想受苦受难的同胞，少考虑个人得失，眼向前看。就像大姐似的，她割掉的不是脚趾而是封建主义，用坚强意志迎接新时代。我们也要每人割掉自己身上的污秽、与《共产党宣言》不附和的污秽。”

从王祝晨家出来，邓恩铭又跑到院前大街2号的齐鲁通讯社售书部踏书看。同年9月25日，齐鲁通讯社售书部迁到大布政司街20号，扩充为齐鲁书社，王乐平任社长。

在这里，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及鲁迅的著作，邓恩铭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如省立第一师范的王尽美、山东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学生王象午和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。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，探讨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。

1920年夏秋之际，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，联络一批进步青年，秘密成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。恰在此时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，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。

王乐平自己没有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工作，而是推荐王尽美、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，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。为了广泛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，邓恩铭和王尽美等决定组织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学会，取名为“励新学会”。

1920年11月21日下午，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在商埠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召开励新学会成立大会。如今的中山公园，庭草寂寂，早已不复当年的繁闹。只有翻阅邓恩铭在《励新》杂志上发表的《改造社会的道路》，可以窥见穿透时空的思想光芒。在1920年12月15日刊发的《改造社会的批评》一文中，他写道：

“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，东西洋社会学输入到中国，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——阶级低——贫——女人——人，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。于是罢工啦，罢市啦，罢课啦，家庭革命啦，社会公平啦，这种种的事体，种种的声浪，充满了我们的耳鼓。像这样的改造社会，实地练习，是实在的，是改造社会的先驱，是极有希望的！”

“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，什么也是

好的，不用心研究。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，情况既不同，那么，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，更是洪水猛兽了。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，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，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，然后取长补短，才不至于徒劳无功。”

“最憎恶的是名与利”

1921年6月，上海早期党组织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，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联络后，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参加。

之后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赴沪筹备大会。他中途在济南停留一天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等8名同志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进行畅谈，交流对建党的看法。张国焘走后，王尽美、邓恩铭作为山东推选的代表，动身前往上海，出席中共一大。

在一大会上，邓恩铭大开眼界。回济南时，他和王尽美带回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。他与王尽美进一步认识到宣传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，开始酝酿成立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

“1921年9月间，我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会址设在山东省教育会内，门外挂着很长的牌子，上写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’。”当时《白话报》编辑段子涵曾回忆道。

至1922年4月间，段子涵去拜访王尽美。“他和邓恩铭同志谈话，看神情好像研究事情。我三人谈了几句闲话。”段子涵回忆道，邓恩铭郑重地说：“济南的报纸，对于劳动人民的事均没有刊载。报纸为人民之喉舌，你们当新闻记者的，对劳动人民的疾苦，应当注意，多替他们说几句话，唤起一般人的醒悟。我作了几句白话诗，请你登载《白话报》上很合适。”

段子涵接过来看了看，共分三段。最遗憾的是全文不记得，仅记住了三句：“皎洁的月亮悬在天空，路上行人没了人影，只听见住在胡同道儿的铁匠，叮咚、叮咚，不住他的劳动。”

其实，邓恩铭也像铁匠一样，敲敲打打修补社会疮疤的同时，他的日常生活却异常拮据。1918年，邓恩铭的姑姑从济南回家乡，17岁的邓恩铭在姑姑的信中却行文成熟：“在东困苦命运使然，幸勿为家人道，恐明合家增忧也。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，明到东办入学情形，望姑丈择便者道之。”

家人原期望邓恩铭读书做官以光宗耀祖，他对此却非常反感。1924年5月8日，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：“儿生性与父不同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，故有负双亲之期望，但所志既如此，亦无可奈何。”在家人的多次规劝下，他仍然继续革命斗争。他在信中说因党的“职务缠身”不能回家结婚，明确表示：“儿主张既定，决不更改。”

走上革命道路后，邓恩铭也时常想念老家的亲人。在昏暗的油灯下思忖着老家，他笔端流露出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：“今年三菊，小印的书籍，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。春天气候不一，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。”“母亲身体总要好保养，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，鸡蛋、牛乳、牛肉，千万不可乱吃药，吃错了就坏事，务必注意。”

1925年9月，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，说家乡遭受旱灾，希望能寄钱回家，帮助熬过灾荒。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：“我从济南回到青州，就知道家乡多灾。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，使老少少受点困苦，实在是罪过！但是，弟弟们，你们要原谅我，因为我赋性刚直，脾气不好，在这样的时代，实无我插身地，兼之我又不会巴结，所以在外飘泊两年，只能谋个人的温饱，无力顾家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，不是我目无家庭也。”

其时，邓恩铭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。如果他拿出一点钱，寄回家并不难。可他连想都没想，大公无私、清廉本分可见一斑。

“不惜惟我身先死”

1922年5月，中共济南独立组建立。在济南第一中学读书的马骥塘曾回忆道：“那时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知道的很少，只是向往‘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’的理想。我把《共产党宣

言》带回家去，我父亲看了，极为称赞，说马克思是‘圣人’。”

邓恩铭在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，积极发展党组织。“在1923到1924年间，乡下也有了党支部，党员多数是学生，也有农民。共产党员能联系群众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，在群众中有威信。譬如说到陌生的地方找党员，不知道详细地址的话，可以同拉洋车的或街头泡茶水的拉话，他们提起街坊上某某先生，为人挺好、老实、肯帮助人，大概就是党员。”马骥塘回忆道。

1923年，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，他孤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。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。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，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，觉悟高，在1923年10月4日写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说：“四方极有希望。”

可希望背后，也有种种掣肘的因素。当时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两年多，还是个几百人的小党，经费非常紧张。刚到青岛，一无组织，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。“我经济极窘，款速汇来。”1923年10月18日，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如是要求。

当时，邓恩铭在《胶澳日报》担任副刊编辑，“我在胶报仅有饭吃，一切费用均须自筹”。在存世的邓恩铭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，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，明确要求增加经费、速寄经费的有12封，可见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。

比经济问题更难应对的是政治的险恶。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，在这里建党、团组织，开展工人运动，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，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。此外，由于德、日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，部分青岛人的政治、民族意识较淡薄，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，青岛“民不与我合作，凡事把我们除外”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邓恩铭毫不畏惧。他认为：“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沃土，随地可以种植。”1925年2月，他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，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。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，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，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。1925年4月1日，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：“世界是工人的，现在我们缩小些说，青岛是工人的。”

1927年下半年，邓恩铭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，中间又曾任青岛市委书记，旋调回。他经常在济南东流水街105号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进出。这座月牙泉边的小楼，如今依然屹立。邓恩铭在此逼仄的空间办公时，无限欣赏风景，他忙着开会、办公、接待来人，领导全省革命运动。

1929年1月，王复元、王用章兄弟叛变，山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，邓恩铭等同志不幸被捕。在狱中，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，他的病疾也在此时复发，但他咬住牙关，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，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。

1930年，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。他自知余日不多，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绝命诗：“卅一年华转瞬，壮志未酬奈何天；不惜惟我身先死，后继频频慰九泉。”

1931年清明节，邓恩铭的堂弟滕尧亲亲手做了几个南方好菜，把洋瓷盒装得满满的，送到了经二路东段的山东省立第一监狱。邓恩铭的家人听监狱的人说，邓恩铭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原来，当天凌晨，纬八路刑场上，21位共产党人纵横在草地上，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。年仅30岁的邓恩铭，与其他20位共产党人一起，用鲜血沃育着这片土地，浇灌着国富民强的希望之花……

消息传来，大家都惊呆了，包括邓恩铭家做工的人，都抱头痛哭。“我们前去收尸，反动当局不准。后经过多方周旋，请了四家连环铺保，第三天才到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。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，洗净他身上的血迹，把他安葬在济南城外的贵州义地里。”滕尧亲曾回忆道。

不久，邓家又请人在邓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，写上“邓恩铭之墓”，烈士从此在济南长眠。